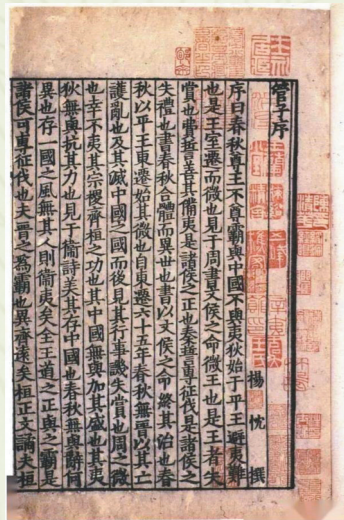


古听籍



《管子》治国理政思想独特

程磊

《管子》是管仲及其学派的言行事迹以及先秦学术著作。《管子》所蕴含的思想兼收并蓄,它不囿于某一家之成说,而是集诸家之所长,最终熔冶于一炉,形成独特的治国理政思想,可谓是先秦时期各学派的言论汇编。

说到《管子》,就不得不提到它的灵魂人物——管仲。管仲,名夷吾,颍上(今安徽颍上县)人,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、改革家。齐桓公还没有成为国君时,管仲辅佐公子纠与齐桓公争夺君位,还曾射了他一箭。齐桓公争位成功做了国君后,不仅不记管仲的“一箭之仇”,反而还任命他为相。管仲任政于齐国,大兴改革,发展生产,整顿军队,辅佐齐桓公“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”,成就了春秋首霸的功业。

管仲为齐国的富强作出了重大贡献,在当时备受推崇。齐桓公尊称他为“仲父”,事事都听取他的意见,甚至把国政交予管仲,自己专心享乐。管仲、齐桓公去世后,齐国虽然失去了霸主地位,但延续了桓公时期的政令措施,国家依然保持强盛。为了纪念管仲,他的思想和言行被记录在《管子》一书中,寄托着世人对桓公霸业的追忆。

《管子》一书比较完整地记录了管仲辅佐齐桓公建立霸业的始末,连贯的叙事,是一部宏大的史诗。《管子》系统总结了当时齐国治理国家的思想和举措,内容涉及各个领域,因此说它是治国理政的百科全书也不为过。《管子》对法律的作用分析为:“法者,所以兴功惧暴也;律者,所以定分止争也;令者,所以令人知事也”,但同时也揉合了儒家思想,例如《管子》认为“凡治国之道,必先富民。民富则易治也,民贫则难治也”。又如《管子·霸言》中:“夫霸王之所始也,以人为本。本理则国固,本乱则国危。”《管子》还有经济学的观念,《乘马》一章中指出:“市者,可以知治乱,可以知多寡,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。”

《管子》宋代出现刻本。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宋浙刻本,是现存《管子》最早的刻本。这一版本的《管子》,每半页12行,每行23字、24字不等,白口,左右双栏,单鱼尾,注文为双行小字。首列杨忱管子序,次列管子目录,次列刘向进书序,书后有张嶷《读管子》一文。书中钤有若干名家的藏书印,包括文征明、王宠、文伯仁、季振宜、徐乾学、黄丕烈、汪士钟、陈澄中等。这些藏书印展示了《管子》自明代以来迭经名家收藏的历史轨迹。

体现文人思想情趣 《七十三壶图》

胡胜盼

宁波天一阁是明代嘉靖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楼,创建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(1561年—1566年)之间,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民间藏书楼,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民间藏书楼之一。

天一阁藏书楼藏有2部《七十三壶图》,一为康熙本,一为雍正本。这2部古籍原本不为人知,2010年被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吴光荣在天一阁发现,连称“紫砂秘籍”。与同时期别的紫砂壶著作有无图相比,《七十三壶图》是一部罕见的图文并茂的清康熙紫砂壶图集,是明清时期紫砂艺术的珍贵纪录。

康熙本《七十三壶图》稿本,原为著名藏书家朱鼎熙先生收藏。先生过世后,其家属遵照其遗愿,于1979年将先生的10万余卷藏书、900余幅字画、800余件器物,捐给了天一阁博物院。康熙本《七十三壶图》便是10万卷书中的一本。雍正本《七十三壶图》稿本,为天一阁上世纪八十年代接受社会流散文物收藏。两稿本作者同为普荷,两稿本相比较,康熙本好于雍正本,雍正本开本略小一点,内容上前后排列顺序有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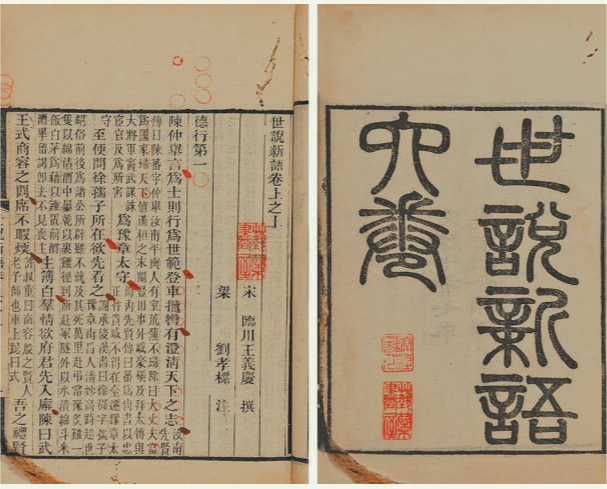


变化。相同的图,雍正本更像是临摹康熙本,壶图及书法均不如康熙本。康熙本《七十三壶图》,扉页上写“康熙癸卯春三月”(行书)“七十三壶图”(隶书)“晋宁普荷书”(行书),竖排各一行。右下角钤“子孙保止”,篆文方印;左边“晋宁普荷书”,下端钤“普荷”“担当”,篆文方印。

《七十三壶图》图文并茂,每页面上端为壶名,由右往左书写,字体有篆书、隶书、行书、草书等,下端为壶图。每幅壶图上在壶形的右端钤葫芦形“玉如”篆字朱文印,页面空白处左下端钤“赏奇”篆文方朱文印。由《七十三壶图》壶名及造型来看,壶艺分为仿青铜器造型的果盘、商史卣、商钟、周盘、石鼎等,也有取材于瓜果、植物形态的瓠瓜、饮瓢、橄榄、桐叶等造型,还有如意、簪孟、提筐等形状。从《七十三壶图》稿本中所有的壶名来看,大多为明清两代文人参与设计制作的茗壶,故称其为文人壶。所谓文人壶,是文人雅士所倡导的取其内涵,重其神韵、形态、意趣、文心等,将文人的思想、情趣、喜好、审美等因素及时代特征,直接融入壶艺创作中所形成的风格特征。

《七十三壶图》稿本为我们保存了

《世说新语》最早文言志人小说



雷煊

《世说新语》由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撰,梁代刘孝标注,是魏晋南北朝时期“笔记小说”的代表,也是我国最早

一部文言志人小说,主要记载了东汉后期到魏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。目前流传下来的共3卷36门,有“德行”“言语”“识鉴”“贤媛”“规箴”等,所涉人物1500多个,无论帝王将相还是隐士僧侣,都气韵生动,传递的

特立独行的“魏晋风度”有如光风霁月,令无数读书人心向往之。清初杭州诗人“西冷十子”之一的丁澎称:“宏长风流,隽旨名言,溢于楮墨。故通人雅彦,裙屐少年,皆喜观而乐道之。”

《世说新语》语言清微简远,有丰厚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艺术特色,语言雅俗兼备,所记魏晋人物语言玄远高雅,又深意隽。《世说新语》中的魏晋名士思想解放,感情丰富,精神自由,智慧卓越,勇于表达自己的感情,阐述自己的思想。鲁迅先生把《世说新语》在艺术上的成就概括为“记言则玄远冷隽,记行则高简瑰奇”。全书用对照、比喻、夸张与白描的修辞手法,保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佳言,许多广泛应用的成语便是出自此书,例如难兄难弟、拾人牙慧、咄咄怪事、一往情深等。该书对人物描写重在心理,但都集中到一点,就是重在表现人物的特点。通过特有的言谈举止,表现出了人物的独特性格。

《三国志》治史态度影响后世

朱卫东

《三国志》,二十四史之一,也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“前四史”之一。《三国志》是一部记载三国时期曹魏、蜀汉、东吴等政权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,全书共65卷,其中《魏书》30卷,《蜀书》15卷,《吴书》20卷。书中完整记述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(公元220年),到晋武帝太康元年(公元280年)60年间,从群雄割据到天下归一的风云变幻,与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并称“前四史”。

《三国志》作者陈寿,巴西郡安汉县(今四川省南充市)人,三国蜀汉及西晋著名史学家。陈寿自幼刻苦好学,精研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等史书,时人盛赞他擅于叙写史事,具有良史之才。《三国志》一经问世,深受好评和称赞。尚书郎范滂上表皇帝说:“陈寿作《三国志》,辞多劝诫,朋乎得失,有益风

化,虽文艳不若相如,而质直过之,愿垂采录。”将其与西汉司马相如作比较,可见评价之高。

《三国志》良史实录的治史态度对后世史学家影响非常大。虽整体叙事简略,却也不乏精彩片段,如“赤壁之战”就描写得绘声绘色,令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。书中关于名士风雅、谋士多智、武将威猛的描述着墨不多,却栩栩如生。

现存最早的《三国志》版本是新疆博物馆珍藏的《三国志·吴书·孙权传》手抄本残卷。这本残卷1965年1月出土于新疆吐鲁番英沙古城的一座佛塔遗址,纵23厘米,横72.6厘米,残存40行,墨书570余字,纸质精良,文字规整清晰。据考证,手抄本的年代是公元265年—公元420年间,字体为“经生体”。“经生体”是一种抄写佛经时使用的字体,也叫“抄经体”,用笔丰腴、字距紧密、运笔灵活、富有动态,从中可以领略到1700多年前吐鲁番人书法艺术的风采。

《授时历》与今天公历有渊源

马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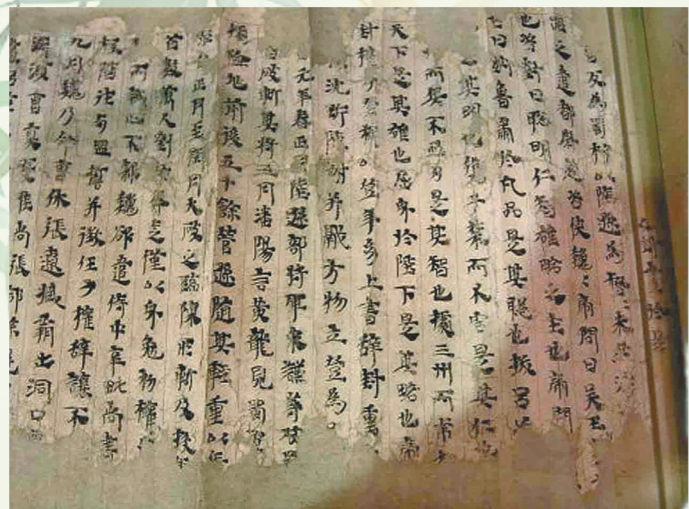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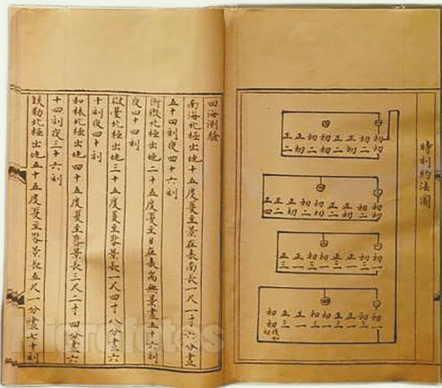
《授时历》又名《授时历经》,是元代郭守敬等杰出科学家克服了修订历法中的重重困难,通过一系列精准的天文测量,在前朝历法基础上精确制订完成的一部历法。

公元1276年,元世祖忽必烈迁都大都,采纳大臣刘秉忠生前的建议,决定修订历法。朝廷下令,在京城组织历局,调动全国各地天文学家,修订历法,命许衡“领太史院事”,并以郭守敬、王恂为副,共同研订编制。由精通天文和数学的王恂具体负责历局事务和具体编算工作。王恂推荐好友郭守敬参与其中,因为他擅长制器并通晓天文。郭守敬对以前的观测仪器除旧布新,发挥自己聪明才智,创制了一套更加精密的仪器,为修历工作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。

公元1277年,元世祖忽必烈接受了郭守敬的建议,派14名天文学家到国内26处地点进行了几项重要的天文观测,历史上把这项活动称为“四海测验”,测定了夏至日的表影长度和昼、夜时间的长度,为修订历法提供了精确的数据。这次测量,最北到达西伯利亚,最南到达南海诸岛。通过一系列精准的天文测量,并且在南宋《成天历》的基础上,郭守敬等人成功精确地制订完成了新的历法。公元1280年春天,元世祖为历法取名《授时历》。

这部历法反映了当时我国天文历法的新水平,其中有不少革新创造,规定一回阳年为365.2425日,比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时间仅差25.92秒,和现代世界通用的公历完全相同。在编制过程中,他们所创立的“三差内插公式”“球面三角公式”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杰出成就。

《授时历》规定每月为29.530593日,设置了闰月,废除了古代的上元积年,截取近世任意一年为历元,打破了古代制历的习惯,是我国历史上第四次大改革,为后世历法执行提供了范本。《授时历》是我国历史上施行最久的一部历法,长达364年。后来,朝鲜、越南等国家都曾采用过《授时历》。这部历法随着郑和下西洋被介绍到欧洲,形成了《格里高利历》,也就是今天的公历。



打开中华典籍 汲取文化力量